

# 论基层群众选举认知与行动间的悖论<sup>〔\*〕</sup>

徐理响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基层群众的选举认知、参与行为与基层选举质量和基层治理之间存在正向性关联。提升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不仅事关基层选举的质量和基层治理的品质,同时对引导其理性参与其他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政治过程皆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A省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可以看出:一方面,当前广大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积极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选举知识、参与意识明显提升;但另一方面,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数量和质量并不与其选举认知相匹配,总体观感是大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并不高。基层群众选举知识的累积、选举意识的提升,虽然并没有完全实质性转化为选举行动,但依然有其独立的价值,对于规范选举过程,提升选举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反映了我国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意识与民主自治意识的实质性进步。选举认知与行动间的差距则启示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选举制度,优化选举过程,培育现代的积极、理性的参与型选举文化,将基层群众积极的选举认知化为良性的选举参与,乃至优质的基层治理行动。

〔关键词〕基层选举;选举认知;选举行动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1.009

选举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选举更是亿万基层群众实现民主选举权利最为直接的形式,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战略意义不可小觑。参与基层选举是公民公共精神的体现,也是一项应尽的公共责任,同时亦反映出公民的公共能力,对基层选举质量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选举实践,理应为基层群众选举意识和能力的提升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与实践时间,学界也曾经乐观地认为,选举经验的积累和民主价值的

内化,会为未来选举质量提高提供基础,会影响基层群众其他基层治理参与行为的质量。然而,“制度的规定更多的是理想化和文本化的,基层的实践则是生动的、多元化的”,<sup>〔1〕</sup>总体性观察,现实中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数量、质量与人们的期待还有着较大的差距,选举中的冷漠、失范、脱序现象大量存在,基层选举的品质与发展前景远不像当初学界所预期的那样,以至于有研究将之概括为“无主体性”基层选举。<sup>〔2〕</sup>如何理解这种预期与现实间的差距?伴随基层选举实践的深

作者简介:徐理响,政治学博士,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层选举中选民公共理性的提升研究”(项目编号:16BZZ042)的阶段性成果。

入开展,基层群众的选举认知与选举行为到底呈现何种状态和趋向?本文基于对2018年A省20个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观察,从选举认知与行动两个维度,透视目前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现状。

### 一、选举参与、选举质量与基层治理品质

民主的本质在于参与,没有普通群众对公共政治生活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参与,民主将失去基础。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形式之一的选举参与,其意义更是无须赘言。普通群众的选举参与既是政治系统汲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是政权的政治认受性之所系,也是其习得政治知识,展开民主训练的重要舞台。当代中国的基层选举主要包括基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和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乎基层选举和基层民主的质量,并进而影响基层治理的品质。

从基层选举的诸要素来看,基层群众选举参与是整个选举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变量之一。“村民的投票动机以及投票行为的选择是民主选举的微观层面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最真实和最基础的表现。”<sup>[3]</sup>首先,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的实现度。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无论是村庄中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治,还是县(区)乡(镇)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与基层群众的直接联系是最为紧密的,是基层群众当家作主最为直接的形式。因此,在基层选举中,基层群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应有效度的发挥。其次,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影响着基层选举的效率。在基层选举中,无论是选民登记等基础性环节,还是候选人提名确定、正式投票等核心环节,没有基层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客观上都会造成选举成本高昂,选举变成“费时费力”之事。相反,选民的主动参与,能够降低诸如选举宣传、动员等成本。最后,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也是规范基层选举行为的重

要监督机制。基层群众广泛、深入地,积极、理性地参与选举的行为,将会极大地降低选举操纵、贿选等存在的空间。总体来看,优质的选举参与是提升基层选举质量的基础工程。

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质量,外显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内蕴为参与的主观态度。从参与的广度来看,不仅表现为参与投票的选民比例,而且表现为对选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参与数量。以村(居)民委员会选举为例,前者直观地表现在选民的登记率和参与投票率;后者则表现在选举宣传、推选选举委员会、改选村(居)民代表、选民登记、提名确定候选人、选举竞争、投票选举等各个环节中选民的参与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在基层选举中,如果选民投票率低,选举的质量当然不会太理想,但如果选民只关注和参与最终的投票环节,选举的质量同样会大打折扣,高质量的基层选举离不开基层群众的全程、全方位地参与。从参与的深度来看,表现为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主动度与投入度。从参与的主动度而言,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形态可以分为主动型、动员型、消极型等。显然,如果大多数基层群众的选举参与都是被动的,甚至是消极应对的,也就难言高质量的基层选举。从参与的投入度来分析,大多数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是否持续关注,是否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投票时是基于深思熟虑还是临时选择,等等,这些无疑都直观地反映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深度。在实践中,有的基层群众虽然参与了基层选举,但更多的是以“旁观者”而非“主体”身份参与选举,其参与的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基层群众参与选举的广度与深度深受其对基层选举的基本认知和态度的影响。“基层选举作为一种法律制度,需要社会环境作为介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导致不同的制度实践效果。”<sup>[4]</sup>积极、理性的选举认知,可以建构选举的意义,激发基层群众参与的积极性;有助于端正选举态度,形成优质的选举情感与评价;能够规范选举行为,化约非良性选举心理,促进理性参

与;最终达致引导选举结果,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良性结合。概言之,高质量的基层选举参与离不开优质的选举态度;或者说,要提升基层选举参与的质量,首先需要培育和引导基层群众建立健康的选举认知、情感和评价。

优质的选举参与、高质量的选举过程与结果,不仅关系到基层群众的直接民主权利,关系到基层社会的稳定,而且与选举后的基层治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如果在基层选举中,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数量与质量高,选出来的基层干部代表性相对就会比较高,一般也都会有较高的威望,有利于基层民主自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如果基层群众在基层选举中表现得较为积极和主动,一般在选举后的基层治理中亦会较为活跃,<sup>[5]</sup>这为化解当前基层治理中所谓的“主体性”缺失,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选举参与、选举质量与基层治理和善治之间的正向性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对此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持续跟踪研究,相关成果较为丰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层选举的品质与发展前景并没有像当初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基层群众的选举热情不高,基层治理的品质并未随着选举的实践而提升,学界对基层选举的研究兴趣似乎也逐渐衰减。如何提升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数量与质量,不仅事关基层选举、基层治理,同时对引导基层群众理性参与其他公共事务、公共政策、政治过程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二、选举认知的提升:A省村(居)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选民问卷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选举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至1953年的人大代表选举。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基层选举渐而成为城乡基层公共生活中人们非常熟识的政治大事。伴随着基层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实践,基层群众的选举知识、选举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2018年是A省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年。我们选取了20个换届观察点,覆盖全省各地市,其中村委会14个,社区居委会6个,对1500名村(居)民就选举认知开展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272份。在所调查的对象中,男性占63.6%,女性占36.3%;年龄18—45周岁占35.1%,46—60周岁占36%,61岁以上占28.8%;文化程度主要集中于初中、高中区间。从问卷分析结果来看,基层群众对于基层选举的认知与态度并非呈现如一般观感上的冷漠、被动、消极的特征。

第一,关注基层选举,特别是与基层群众日常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90.5%的被访者认可村(居)民委员会在村庄(社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3.4%的人认为不重要。在被问及最关注哪一类基层选举时,66.8%的人表示最关注村(居)民委员会干部的选举,21.9%的人表示最关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而选择都不关注的仅为4.4%。在被问及“选举期间是否关注各种选举公告”时,选择经常关注的占67.7%,偶尔关注的占17.8%,而很少关注的仅占7.4%,不关注的占5.8%。当被问及“是否关注最终的选举结果”时,回应关注的占84.1%,不关注的只占6.77%,无所谓的占7.9%。因此,从调查数据看,并不支撑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漠不关心的观点。

第二,有良好的选举知识和自治知识积累。80.9%的受访者认可“村(社区)里的事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事,每个人都应该参与”,而只有8.1%的人认为“是村(居)干部的事”,4.9%的人认为“是党和政府的事”,不清楚者占5%。在被问及“是否了解村(居)民委员会干部候选人如何确定”时,86.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了解或一般了解,表示不了解的仅为12.7%。当被问及“应由谁来提名村(居)民委员会干部候选人”时,回应“由我们村(居)民自己来推荐”的高达70.4%。<sup>[6]</sup>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自治实践和基层选举历程,对基层群

众选举知识和自治知识的积累与提升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第三,主观参选态度较为积极。在被问及“是否会主动参加选民登记”时,认为自己会主动参加的高达87.6%,不会的仅占11.9%。问及“是否愿意竞选村(居)民委员会干部”,回愿意的达52.4%,不愿意的38.4%。认为参加投票“应该是自己积极主动参与”的占84.7%。当问及“你是否愿意联名推荐候选人”时,选择愿意的占81%,不愿意的16.9%。当询问“是否愿意在选举期间做些志愿性服务工作”时,选择愿意的占94.3%。从结果来看,至少在主观认知层面,大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态度是积极的,这是基层选举能够良性运行的基础,也是我国基层选举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基础。

第四,对基层选举有更为深入的理性观察与思考。在主观认知上,大部分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并非如“动员型模型”所描述的被动型参与,对选举过程缺乏深入和理性的思考。随着参与基层选举经验的积累,基层选举知识的提升,更多的基层群众开始更为理性地观察和思考基层选举中的诸种现象,可谓“心中有杆秤”。当问及是否认真考虑过谁当村(居)民委员会干部,表示认真考虑过、偶尔考虑过和没有考虑过的分别占69.5%、14.7%、14%。当问及“最终如何投票”时,选择“深入了解,慎重选择”的占63.6%。当被问及“如果有熟人暗示选特定候选人,你会怎么做”时,选择“依然按自己意见投票”的占78.2%，“视与我的关系而定”的占2.79%，“视该候选人情况再决定”的占9.6%，“绝不投其暗示的候选人”的占8%。问及“如果有人许诺你选了特定候选人后会给好处,你会怎么做”时,选择“依然按自己的意见去投票”的高达75.8%,而“视好处大小而定”的仅占7.4%。在被问及“如果发现选举中有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地方,是否会向有关组织反映”时,回答“会的”占78.8%。可见,基层群众的“无动机型”投票正逐渐被“有动机型”投票所取代,“村民投票

的动机即便是出于私利的考虑,也不完全局限于私人社会网络的范畴”,<sup>[7]</sup>基层群众选举理性度明显提升。

从A省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基层群众的选举认知调查结果分析,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自治和基层选举的实践,广大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意识明显提升,基层群众并不如某些描述中所展现的那种文化水平低、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毫无选举常识、对选举持疏远态度的冷漠的选民。实际上,从A省的案例来看,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有着清晰的认知、积极的参与意识和理性的思考。

### 三、悖论的产生:A省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选民参与行为的观察

随着基层群众选举知识的增多,自主意识的提升,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数量与质量也趋于上升,选举有时不再是“波澜不惊”。如T村观察点的正式投票结果,收回有效选票2327张,主任候选人虽然以1900票当选,但另一候选人也获得了346票,当选的两名委员候选人分别获得1898票和1810票,但另一落选委员候选人亦获得759票。值得注意的是,除了5名候选人外,还有14人获得“另选他人”的票,最高的获得198票。在本次A省换届选举中,有数个村庄出现“另选他人”当选的现象,而一些有着特定要求的“定岗”候选人因获得选票不够无法当选也屡见不鲜。在选举过程中,一些选民提出异议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如有观察员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在某社区选举委员会推选过程中,当举手表决推选完成后,有一位居民代表突然发言提出异议,‘为什么我们(居民代表)没有(社区选举委员会)提名权,也没有群众代表被选入社区选举委员会?’社区党委书记解释,‘主要考虑选举委员会成员事务性工作较多,如果群众想了解情况,可以找我们,也可以看宣传栏公布的内容’。该居民代表对此解释不满意,坚持表示,‘我想推荐某某,他特别关心社区工作,积极参加



社区活动,经常反映群众意见’。”有连任的村委会主任也向我们表示,现在换届选举不同于以往,不少村民会在这一期间就村庄事务不断地提出各种要求,明显感受现在选举对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了。这些案例同上文的问卷调查结果都清晰表明,基层群众的选举意识正在提升,并一定程度地化为了实际的参与行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选举观察中,上述现象并不常见,总体观感是大部分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的积极性并不高。典型表现在:一是委托投票多,影响选举质量。二是自愿型参与少,动员型参与多。

按照选举规程的规定,“登记参加选举的选民,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可以委托本村(社区)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每一位登记参加选举的选民接受委托投票不得超过三人,并应办理书面委托手续”。在实践中,这一环节相对混乱,委托人和受委托人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委托关系,受委托人是否能忠实于委托人的意愿,都无从知晓,对此也无人关注。由于无明确统计,无从知晓实际的委托投票率,根据观察估计,委托投票数占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的30%左右。从委托投票率来看,这部分选票对实际投票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委托投票率过高,显然有损选举质量,也说明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不够。在对99名新当选的村(居)委员会主任的问卷调查<sup>[8]</sup>中,当问及“如果取消委托投票,您觉得原准备委托投票的选民是否会来投票”,40.4%的被调查者认为“极少部分会”,认为“不会”的占11.1%,认为“一部分会”的占34.3%,只有14.1%的被调查者认为“大多数会”。从中也不难看出相当部分的普通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缺乏参与的热情。

所谓动员型参与,即选民参与选举过程,并非完全基于个人意愿自愿自主地参与,往往是在外在力量的引导、鼓动下被动参与选举过程。与自愿型参与相比,动员型参与往往质量不高。在对村(居)干部的访谈中,大部分都提及最大的

困难在于基层群众参与的主动性问题。上述的对99名新当选的村(居)委员会主任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观察中,不少村(居)干部反映选民登记环节工作量大,非常复杂,希望考虑改革选举规程中关于选民登记的方式,如采用自愿登记等。但自愿登记就必然涉及到对登记率的规定问题。在A省的《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规程》中规定,“采取直接选举的社区可以进行选民自愿登记,但登记参加选举的居民不得低于总数的40%”。观察发现,大部分采取自愿登记的社区登记率都只是稍高于40%的底限规定。即便是40%的登记率,也并非是完全自愿登记的结果。有的社区采取了自愿登记与入户登记相结合的形式,有的干脆直接调出户籍信息筛选登记造册。有观察点的报告中就描述道:“我们通过对4个固定登记点现场的观察,发现前来登记的选民人数很少。在选民登记期结束以后,我们查看了4个固定登记点的选民登记表,登记的选民人数一共只有63人。”在对村(居)委员会主任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如果采用自愿登记会出现何种结果”时,认为“大多数人会主动登记”的仅占27.3%，“大约一半左右的人会主动登记”的占32.3%，“少部分人会主动登记”的占31.3%，“极少部分人会主动登记”的占9.1%。由此可见,这些村(居)干部对自愿登记实际上持较为悲观的态度。在对普通基层群众和村(居)干部两份问卷的结果对比分析中发现,村(居)干部对基层群众参与选举积极性的评价要低于普通基层群众。如在对普通基层群众调查中问及“最终如何投票的”这一问题时,选择“深入了解,慎重选择”的占63.6%,而村(居)干部的回答只有48.5%。对“选举期间是否关注各种选举公告”,普通基层群众选择“经常关注”“偶尔关注”“很少关注”的分别占67.7%、17.8%、7.4%,而村(居)干部的回答分别为52.5%、37.4%、10.1%。当问及“选举竞争是否会提高参与选举的热情”时,普通基层群众回应“会”“影响不大”“不会”的分别

占70.3%、18.5%、9.6%，而村（居）干部的回答分别为53.5%、39.4%、7.1%。差别最大的是，当问及“村（社区）里的事主要是谁的事”，普通基层群众选择“我们自己的事，每个人都应该参与”的高达80.9%，而村（居）干部的回答只有22.2%，普通基层群众选择“村居干部的事”只有8.1%，而村（居）干部的回答则高达66.7%。从两者的差异中，不难体察出普通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与自治的认知与其实际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

一方面，普通基层群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关注基层选举，有良好的选举知识和自治知识，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对基层选举也有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这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实践和基层选举的常态化运行，对提升基层群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与民主选举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基层选举与治理实践中，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与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并不高，与其认知有着不小的差距。基层群众对基层选举的参与，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尽如人意。从政治认知与政治参与间的关系来看，基层群众积极的选举认知与态度，按理来说，会化为积极的选举行动。但从实践来看，却出现巨大的反差。如果排除问卷调查中受访者按“应然”而不按“实然”作答的干扰性因素，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弥合基层群众选举认知与行动间的距离，对于推进我国基层选举更为良性的运转，提升基层治理品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四、悖论的解释：如何将积极的选举 认知化为良性的选举行动

从公民文化的视角来看，人们积极的选举认知并不必然反映为积极的选举行动。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极少能够符合“理性—主动性”模型。这种模型认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影响”，“消极公民，非选民，缺乏政治信息或具有冷漠感的公

民——这一切都标志着一种微弱的民主制”。<sup>[9]</sup>他们通过对五个国家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发现，回答者的实际政治行为和他们“对自己的行动能力和有义务去行动的知觉”之间存在着距离，“参与政治生活的责任感与实际参与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差距”。<sup>[10]</sup>由此，他们解释道：“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sup>[11]</sup>“公民文化保持着公民的积极——具有影响力的作用以及他的消极作用”。<sup>[12]</sup>即便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较为消极，也不代表这种积极的参与态度是毫无意义的，积极的参与态度有着其独立的意义。一方面，当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有能力影响政治，在必要时，他们会参与政治，“他不是积极的公民；他是潜在的积极公民”，<sup>[13]</sup>这种主观态度就使得政治精英们必须随时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响应，有助于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保有政治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公民们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总是时时事事参与政治，这又为政府良性运转和效率的提升提供了条件。这种既积极又消极的公民文化有助于维持权力和责任之间的平衡，有助于民主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和稳定。

同样，在我国基层公共生活中，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与治理的积极认知，虽然并没有完全地、实质性地转化为参与行动，但至少表明，他们觉得村（居）干部应当由他们选举产生，并且他们相信他们确实可以发挥作用，这就对候选者们产生压力，是对整个选举过程的一种潜在的、隐性的监督性力量，也对选举后村（居）干部们的治理行为形成心理上的约束机制。同时，在特定条件下，这种积极的选举认知也将化为实际的参与行动。在对一些县乡基层干部的访谈中，他们往往谈及，当所在村庄集体资产收益较高，人们参与选举的热情也往往较高；当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人们参与的热情往往也越高涨。学术界的大量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再如，有研究观察到，由于日常村务管理与村民利益有较为直接的联系，其参与的积极性就较高，“村民的村级选

举参与往往具有较强的动员性或非自主性参与特征,而村务管理参与则有较强的自主自动性”。<sup>[14]</sup>

概而言之,一方面,虽然当前基层选举中基层群众的参与数量与质量尚不尽如人意,与社会的期待还有较大的差距,但选举知识的累积,选举意识的增强,反映了我国基层群众民主自治意识与民主选举意识的实质性提升,展现了我国基层民主的进步,反映了基层群众对高质量基层选举与治理的期待。另一方面,选举认知与行动间的差异悖论,亦说明我国基层群众的民主选举态度并不稳定,“转型期中国大陆农民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呈现着过渡性与一定程度混乱的特点。”<sup>[15]</sup>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基层选举制度,将基层群众积极的选举认知化为良性的选举参与,乃至优质的基层治理行动,需要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基层群众积极的选举参与行动的生成离不开基层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大量研究确认,“制度背景在累积层面对选民登记和投票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sup>[16]</sup>人们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与选举制度和过程的民主性、公开性、竞争性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基层群众问卷调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如被问及“基层选举中最大的问题”时,被普遍提及的为“竞争性不足”“候选人介绍不足”“候选人提出环节不透明”“选举宣传不足”等。因此,提升基层群众选举参与的积极性,首先在于确保基层选举制度运作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消解外部的,特别是来自于行政权的不当干预,提升人们对基层选举制度的信任。“如果人们感到能够充分了解信息、所发生的事情与自己有关、而且行动能够产生效果,或者他们非常在意相关结果,以及他们认为能够使事情有所不同的话,他们参与的可能性就更大。”<sup>[17]</sup>其次在于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基层选举制度操作过程中的具体机制。罗斯(Rose,2004)通过对国际民主与选举援助机构数据库分析后得出,战后欧洲各国选举中投票结果的差异可以

由以下因素加以解释:实行自由选举的时间、是否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与义务投票制、是否在休息日举行选举,以及平均选举规模等。<sup>[18]</sup>同样,当前我国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亦受到诸如选举时间、竞选形式等具体运行机制的影响。如影响基层群众参与基层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出务工或异地工作,无法到场”,这是导致委托投票大规模出现的基本原因。如果改变基层选举的时间,如安排在春节这样大部分村(居)民返乡和休假的时间,人们参与的数量肯定会提升。再如,可以丰富竞选的形式。在观察的各个村(居)换届点中,所谓的竞选一般都采用张贴候选人介绍的形式,做得好一点是张贴候选人的竞选宣言,如当选后的工作思路、个人承诺等,也有少部分采用候选人在投票主会场做自我介绍的形式。总体上,竞选形式单一,以介绍性为主,竞争性相对不足。如果采用更为生动活泼的形式,如让候选人与基层群众进行互动,对提高参与热情将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问卷中,70.3%的基层群众都认为如果有候选人到场自我介绍并接受提问会提高他们参与选举的热情,这足以说明。

基层群众积极参与行动的生成也有赖于现代的参与型选举文化的成长。选举认知是选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选举文化不仅包括选举认知,还包括公民对选举的情感与评价,这是比选举认知更深层的政治文化取向。如同菲利浦·萨贝蒂分析阿尔蒙德和维巴的政治文化概念时所指出的,“通过聚焦公民取向,他们把政治文化的概念转化为某种比公众意见更深层、比文化概念更集中的东西”。<sup>[19]</sup>从A省的观察来看,当前,基层群众对参与基层选举虽然有了较高的认知,但还缺乏对参与基层选举较深层次的绩效感和较为理性的情感与评价,还未发展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具有直接影响力的公共政治文化。故而,一方面有较高的选举认知,但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内在动力将这种认知转化为行动。针对特定时期基层群众选举文化的深度限



度,加强选举宣传,优化选举动员的方式,探索第三方机构和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发挥在基层选举宣传、动员、培训、组织、监督中的作用,培育和传导现代的参与型公民文化,就具有了必要性。

总而言之,一方面,基层群众积极的选举认知,具有独立于选举行动与结果的意义,展示了当代中国基层群众民主选举与民主自治意识的进步,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基层群众相对积极的选举认知与相对沉寂的选举行动间的悖论,亦表明了基层群众对基层民主选举有更高质量的期待,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选举制度,优化选举过程,培育现代的积极的参与型选举文化,以期将积极的选举认知化为良性的选举参与和治理参与,提升基层治理的品质。

### 注释:

[1][3][4][7]武中哲:《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差异化后果——基于对LZ市村民选举的调查》,《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2]参见王江伟:《“无主体性”村庄选举及其结构解释——基于江西P村选举观察的探索性分析》,《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如张同龙、张林秀对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和对本社区公共物品的出资意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张同龙、张

林秀:《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与公共投资出资意愿——基于全国5省100村2000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3年第1期。

[6]其中农村村民达83.3%。城市由于按选举规程采用了更为多元的提名方式,该选项的回应相对农村要偏低。

[8]在A省进行的全省新当选村(居)委员会干部培训班上,我们对120名新当选的村(居)委员会主任就普通村(居)民参选情况开展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9份,其中村委会主任55份,社区居委会主任44份。其中35周岁以下占22.2%,35—50周岁占63%,50—60周岁占14.1%。中共党员占94.9%。初中文化程度占3%,高中或中专占14.1%,大专占58.6%,本科及以上占24.2%。书记主任一肩挑占43.4%。

[9][10][11][12][1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422、427、422、426、428页。

[14]肖唐镠、刘英:《村务管理中的农民参与——5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15]肖唐镠、余泓波:《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五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6][17][18]皮帕·诺里斯:《政治行动主义:新的挑战与机遇》,载[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下),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5、623、625—626页。

[19]菲利普·萨贝蒂:《民主化和公民文化》,载[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1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